

试论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 初始时间^{*}

宋玉彬(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教授)

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5.11.006

探索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初始时间,需要具备两项基本条件,一是文献信息的学术解读,二是遗迹、遗物的客观阐释。遵循上述标准,形成了本文命题的学术思考。

根据文献线索,佛教传入中土的时间始于汉朝^[1]。同样是基于文献记载,345年,前燕慕容皝于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立龙翔佛寺”^[2],这是佛教北渐辽西传入东北的初始信息。其时,经历342年丸都山城之战惨败的高句丽,虽然臣服于前燕,但就目前的考古发现与文献材料而言,缺少佛教继续北传的具体线索。370年,前秦兼并前燕以后,没有进一步对高句丽实施军事行动,而是遣使修好、输送佛教。史载,372年,苻坚向高句丽“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3],这是佛教向东北地区纵深渗透的具体信息。高句丽小兽林王不仅接受了佛教,而且为僧侣修建了肖门寺、伊弗兰寺两座寺院,史称“此海东佛法之始”^[4]。不过,通过考证南朝梁代僧人慧皎所撰《高僧传》等文献以

及统一新罗时期崔志远撰写的《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王飞峰提出了新的主张。他认为,“高句丽佛教是在东晋太元末年(约390~396年)由后秦关东僧人昙始传入的,昙始可能是从关中出发由陆路到达辽西,经辽东进入高句丽”^[5]。依据此说,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应推迟至故国壤王末期或好太王初期。上述史料信息表明,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初始时间不会早于前燕亡国。

仅仅依托上述零散的史料信息,显然难以厘清佛教传入东北地区的真实历史进程。因此,学术研究的突破口、学术认识的创新点应该更多地聚焦在实物遗存之上。不过,由于存世的佛教设施、佛教建筑微乎其微,考古遗存成为阐释东北地区早期佛教发展脉络的主要依据。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无论是地表调查还是清理发掘,即便是在遗址已经被确认为佛教遗迹的情况下,遗物中数量最多的标本往往并不属于佛造像,而是主体建筑残留的瓦片。考古资料显示,瓦作产品的出现可以追溯至龙山时代晚期^[6],具有断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度重大课题(编号:10&ZD085)、2013年度一般课题(编号:13BKG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代意义的瓦当则最早见于西周时期^[7],但直至隋唐时期,除了行政衙署、宗教设施,瓦当的具体应用还没有普及到普通民居建筑层面^[8]。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佛教传入中土后,无论是城市类型还是旷野类型的寺院设施,装饰有瓦当的瓦构建筑均是其标志性特征之一。故而,需要考古工作者给予关注的是,如何在出土有瓦当类遗物的旷野遗址中,辨识出佛教寺院遗迹。在缺少关联性遗物的前提下,能否辨识出遗存的佛教属性,事关佛教在东北地区传播时限、推广地域等线索的信息捕捉。因此,相对于依托文献史料、古代建筑而开展的佛教研究,考古学视角下的东北地区佛教遗存之学术阐释更加任重而道远。

二

判断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初始时间,应该以高句丽或渤海时期作为界定其年代上限的标尺。高句丽自小兽林王伊始(或王飞峰所推测的故国壤王末期、好太王初期)、渤海自政权建立之初,其统治集团开始崇奉佛教,这是佛教得以在其境内传播的先决条件^[9]。依据文献记载,学术界推测,高句丽的政治势力曾经到达图们江流域,高句丽的“栅城”应建置于珥春河流域^[10]。高句丽灭亡后,牡丹江流域、图们江流域成为渤海政权的初兴之地。因此,图们江流域具备发现上述时期佛教遗存的可能性^[11]。并且,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在图们江流域,其干流与支流均散布有渤海时期的佛教遗迹,有待廓清的只是相关遗存的年代上限问题。在现有发现的基础之上,如能进一步明确图们江流域是否存在高句丽时期的佛教遗存,则有助于把握佛教传入该地域的初始年代。

据《旧唐书·高丽传》载:“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12]把佛寺置于瓦构建筑之首,说明瓦构建筑是高句丽时期佛教寺院的重要标志。作为例证,1985年,集安市的一处建筑工地曾经共出过金铜佛像、高句丽红瓦^[13]。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高句丽瓦当是国内城出土的“太宁四年”

(326年)纪年铭文卷云纹瓦当^[14]。遗憾的是,由于未能明确“太宁四年”瓦当出土时的原生堆积,故无从考察其所依附的主体建筑的属性。因此,目前还缺少高句丽时期最早的佛教寺院遗存的实证线索。不过,把佛寺置于瓦构建筑之首,是否隐含着高句丽的瓦构建筑始创于佛教寺院之意?可以借鉴的是,随着佛教的传入,飞鸟时期的瓦构佛寺宣告了日本房屋建筑“茅茨土阶”时代的终结^[15]。

在可资利用的文献史料中,目前还缺少有关高句丽时期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具体线索。不过,通过田野调查,在图们江流域的一些旷野遗址中发现了具有高句丽时期形制特征的瓦作产品类遗物标本^[16]。如能将此类遗址准确地断代为高句丽时期,则遗存的性质不外乎“佛寺”、“神庙”两种可能。基于此,考古工作者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专题性的田野工作。

关于渤海时期的佛教,《册府元龟》载,“开元元年十二月,靺鞨王子来朝,奏曰:‘臣请就市交易,入寺礼拜。’许之”^[17]。对此,金毓黻的解读是,“高王元年,遣使朝唐,请入寺礼拜,是为佛教流入渤海之始”^[18]。不难发现,金毓黻的误判有二。首先,唐“开元元年”与渤海“高王元年”虽同为元年,但两者年份不同,前者为713年,后者为698年;其次,“入寺礼拜”只能表明渤海上层社会当时已经崇奉佛教,但不足以证明其为“佛教流入渤海之始”。如此,需要廓清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时间上限,即是以高句丽时期为始?还是以渤海时期为初?在此基础上,尚需进一步解读佛教进入图们江流域的具体途径。

据统计,目前图们江流域出土有瓦作产品类遗物标本的旷野遗址约有40余处^[19]。其中,如果仅以佛教遗物作为甄别遗存性质的标准,可以认定为佛教寺院的遗址约占四分之一。通过开展瓦作产品的类型学考察,虽然多数遗址均只能宽泛地断代为渤海时期,但其中也不乏彰显独特文化因素特征的个性化遗址。例如,珥春市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了兼具三燕、高

句丽形制特征的瓦当,珲春市杨木林子寺庙址出土了具有单纯高句丽纹样特点的忍冬纹瓦当,新近发现的和龙市河南屯寺庙址则出土了带有渤海早期板瓦、瓦当形制特征的遗物标本(图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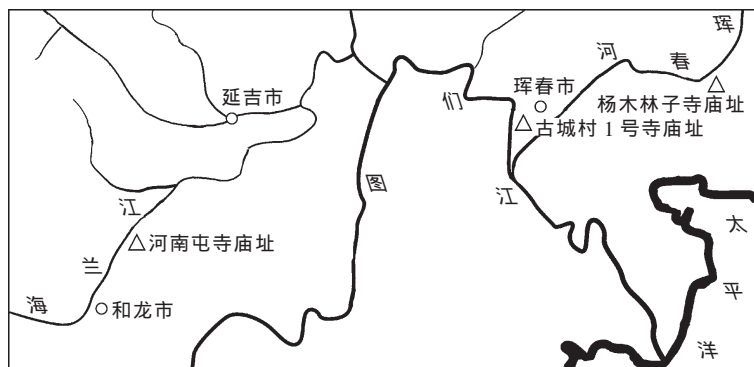
河南屯寺庙址位于和龙市八家子镇河南屯村,地处图们江支流海兰江南岸,与江北的西古城城址南北向相对,两者之间的直线距离约为4.5公里。在该寺庙址以西约700米处,即是1971年发现的渤海时期的陵园式高等级墓葬——“河南屯墓葬”^[20]。由于该墓葬的发现,学术界开始质疑日本学者于20世纪20~40年代调查认定的“河南屯古城”^[21]的遗存性质^[22]。2014年,对“河南屯古城”进行复查时,考古工作者确认了河南屯寺庙址^[23]。遗憾的是,因农民平整土地,河南屯寺庙址已经遭到毁灭性破坏,并且采集的标本中未见佛教遗物。不过,其所出土的带有叶茎的“倒心形”花瓣莲纹瓦当、六棱形铁制风铃与高产寺庙址^[24]、克拉斯基诺寺庙址^[25]所包含的同类遗物形制相近。据此推测,这是一处渤海时期的寺庙址。

为了客观把握河南屯寺庙址的具体年代,本文以“天宝中王所都”的西古城故址——西古城城址作为参照标尺^[26]。就瓦作产品的纹样特点而言,河南屯寺庙址的年代早于西古城。首先,河南屯寺庙址出土的檐头板瓦已经具备渤海时期流行的利用横向三排纹饰带组合纹样

的构图模式,但渤海时期的标识性符号——圆圈纹还没有被确立为主题纹饰。因此,该寺庙址以“>”、“<”、“S”等符号作为主要纹饰类型的檐头板瓦(图二:1、2),其年代不仅要早于西古城以斜线纹复合圆圈纹作为主题纹饰的檐头板瓦(图二:5),而且早于图们江流域诸多旷野类型佛教遗存^[27]。其次,以往的研究表明,渤海瓦当的纹样构图经历了由单一主题纹饰、复合主题纹饰并重向单一主题纹饰转化的演变过程^[28]。河南屯寺庙址出土的A、B、C型等主要瓦当类型均以原创性纹饰构思复合主题纹饰图案,其年代要早于已经流行单一主题纹饰的西古城时期瓦当。最后,虽然河南屯寺庙址也出土了一些单一主题纹饰的瓦当标本,但与其他遗址出土的同类瓦当相比,其形制特征具有一定的母题纹饰因素。例如,同为六枝侧视花草纹瓦当,该寺庙址的D型四叶花草纹瓦当(图二:4),其年代要早于西古城的F型六叶花草纹瓦当(图二:7);同时,同为“倒心形”花瓣莲纹瓦当,该寺庙址出土的带有叶茎的G型瓦当(图二:3),其年代要早于西古城出土的无茎的A、B、C型瓦当(图二:6)^[29]。就瓦作产品的工艺特征而言,河南屯寺庙址出土瓦当所采用的泥片贴筑法制作技术以及粗糙的模印纹饰均属于工艺水准未臻成熟的具体表现。因此,无论是开展类型学考察,还是基于技术分析,与渤海文化成熟期瓦作产品所具有的标志性特征相比,河南屯寺庙址出土的檐头板瓦、瓦当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征兆。初步推定,这

是一处渤海早期的佛教寺院遗存,其始建年代不会晚于西古城为都之时。

杨木林子寺庙址位于珲春市杨泡满族乡杨木林子村,地处图们江支流珲春河南岸,原址已遭破坏。据《珲春县文物志》“杨木林子寺庙址”词条记载,“在遗址采集有莲瓣纹瓦当、带榫头的筒瓦、指压纹瓦、圈线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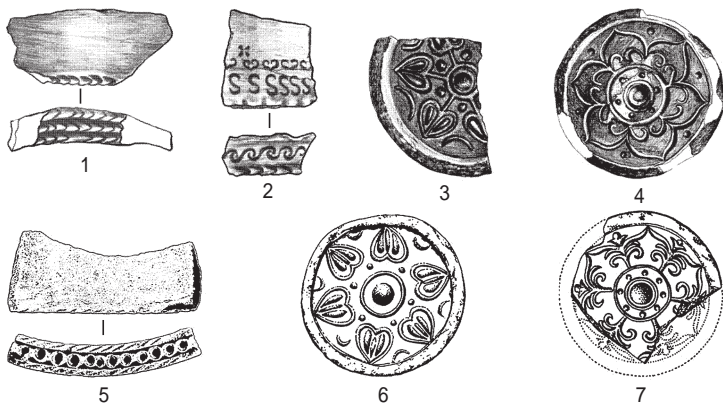


图一 寺庙址分布示意图

瓦、绳纹瓦、席纹瓦以及浮雕石佛像和装饰花纹残片等遗物”^[30]。由于该寺庙址出土的佛造像类遗物已不知所踪,瓦作产品类遗物标本成为判断其年代的重要依据。

该寺庙址出土的瓦当可以分为两型,其纹样均为双重主题纹饰构图类型。

第一种类型,连珠纹复合忍冬纹瓦当,现存2件标本,均残(图三:1、2)^[31]。依据纹样构图,该型瓦当的形制特点是,当外面圈环绕一周连珠纹,内圈施一组左旋忍冬纹。众所周知,忍冬纹瓦当是高句丽时期瓦当的主要类型之一。国内城时期的忍冬纹瓦当,其形制特点是叶子右旋、右叶瘦长、左叶肥硕(图三:3)。高句丽迁都平壤后,忍冬纹瓦当数量减少,其纹样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叶子左旋、左叶瘦长、右叶肥硕的忍冬纹瓦当(图三:4)^[32]。同时,在高句丽迁都平壤(427年)前后,瓦当的构图风格发生了整体性的重大变异,纹样构图逐渐由单一主题纹饰转化为复合主题纹饰。基于此,就形制特点而言,杨木林子寺庙址出土的忍冬纹瓦当,其纹样造型与平壤期忍冬纹瓦当相近。并且,复合主题纹饰的构图风格也符合平壤期高句丽瓦当的时代特点。然而,需要甄别的是,此类瓦当是高句丽时期遗物还是接受高句丽文化因素影响的渤海时期遗物。显然,需要进一步寻找与之相关的其他旁证线索。在图们江流域的一些渤海时期的寺庙址、墓葬中,另见有一种忍冬纹复合“倒心形”花瓣的复合主题纹饰瓦当类型。此型瓦当的忍冬纹明显简化,已经无法辨识其叶子的旋转方向(图三:5)。并且,根据该型瓦当所具备的复合主题纹饰、“倒心形”花瓣等纹样构成因素判断,其年代下限不会晚于西古城为都之时。同时,由于“倒心形”花瓣已经介入其纹样构图,其年代上限要晚于以高句丽文化因素为主的连珠纹复合忍冬纹瓦当。故而,杨木林子寺



图二 河南屯寺庙址、西古城出土器物
1-4.河南屯出土 5-7.西古城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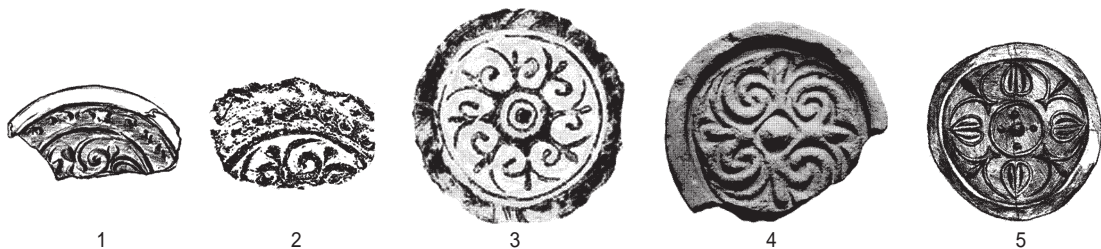
庙址的始建年代不但早于渤海时期,而且还可以上延至高句丽时期。该寺庙址曾经出土的席纹瓦,可作为上述判断的补充证据。

杨木林子寺庙址出土的第二种类型瓦当——弧线纹复合“倒心形”花瓣莲纹瓦当,仅存1件标本,残^[33]。该型瓦当当面内圈饰六瓣带有叶茎的“倒心形”花瓣,当面外圈的每一“倒心形”花瓣环绕有彼此首尾相接的半圆形弧线纹。同型瓦当另见于温特赫部城址^[34],根据其所出土的席纹、网纹、绳纹及回纹板瓦,有人主张该城址始建于高句丽时期^[35]。在这种情况下,与连珠纹复合忍冬纹瓦当以及席纹、网纹等纹饰板瓦相比,显然,弧线纹复合“倒心形”花瓣莲纹瓦当的年代偏晚。对于此,合理的解释是,此类瓦当的具体应用当与杨木林子寺庙址、温特赫部城址的年代下限有关。

既然杨木林子寺庙址的始建年代可以追溯到高句丽时期,意味着该寺庙址应早于河南屯寺庙址。

古城村1号寺庙址位于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地处珲春河北岸,与温特赫部城址、古城村2号寺庙址毗邻^[36]。同河南屯寺庙址一样,该寺庙址也毁于农民平整土地。不过,与河南屯寺庙址、杨木林子寺庙址相比,该寺庙址存在自身的研究优势,可以通过佛造像、瓦作产品两条途径讨论其年代问题。

总体而言,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的佛像



图三 忍冬纹瓦当

1. 杨木林子出土 3. 集安出土 4. 平壤出土 5. 图们江流域出土

具有明显的汉地北朝至隋时期佛造像的形制特征,与渤海上京城出土的唐代风格的佛造像差异明显^[37]。因此,古城村1号寺庙址的始建年代不会晚于渤海以上京为都之时。至于该寺庙址的年代上限,可资参考的旁证材料是,同样地处图们江流域的新生^[38]、良种场^[39]、仲坪^[40]及马滴达^[41]等寺庙址,出土有与古城村1号寺庙址佛造像形制相近的遗物标本。然而,与上述寺庙址出土的明确断代为渤海时期的瓦作构件类遗物相比,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年代更早。

该寺庙址出土的瓦当可分为两型,其纹样均为双重主题纹饰构图类型。其中,A型花草纹瓦当的纹样构图拥有高句丽复合主题纹饰瓦当的形制特点。该寺庙址的B型网格纹复合枣核纹纪年瓦当是本文讨论的重点^[42]。其一,网格纹复合枣核纹的纹样构图模式(图四:1~3)^[43],在北票金岭寺建筑址(图四:4~9)^[44]、朝阳老城北大街遗址^[45]等三燕遗存中,存在形制相近的瓦当标本。尤为重要的是,此型瓦当与金岭寺建筑址同类瓦当系采用相同的套接技术制作而成^[46]。其二,依据当面留存的文字判断,其为干支纪年铭文瓦当。遗憾的是,与年份有关的关键铭文均已缺失,依托“□□年六月作”等残存文字,已经无法识读此型瓦当的具体年代信息。为此,需要系统梳理纪年铭文类瓦当具体应用的时代背景,进而判断本文瓦当的年代。作为图们江流域发现的唯一的纪年铭文瓦当类型,其初始年代应与该地区的行政建置、宗教设施有关,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因素在图们江流域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高句丽时期。因

此,B型瓦当不仅应晚于高句丽卷云纹纪年瓦当,并且其干支纪年的表现形式也应源自于高句丽卷云纹瓦当的影响。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明晰高句丽卷云纹纪年瓦当的使用时限,藉此推断古城村1号寺庙址B型瓦当的年代上限。

高句丽卷云纹瓦当先后经历了年号纪年铭文(太宁四年)、干支纪年铭文、一般铭文、无铭文等发展阶段,其总体年代跨度约为326~391年^[47]。其中,干支纪年瓦当见有以下纪年铭文:“己丑”(329年)、“戊戌”(338年)、“乙卯”(355年)、“丁巳”(357年)^[48]。因此,古城村1号寺庙址B型瓦当的年代上限应该界定为329~357年,其年代下限则应该不会晚于施一般铭文或无铭文的卷云纹瓦当。

此外,透过制作工艺可以看出古城村1号寺庙址B型瓦当所采用的套接技术未见于其他高句丽、渤海瓦当。据此推测,此类瓦当能够在图们江流域得到具体应用,应不仅仅是三燕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它们可能是掌握三燕制瓦技术的工匠所为。问题是,这种技术是如何到达图们江流域的呢?为此,依然需要首先弄清楚三燕同型瓦当的使用年限。

关于金岭寺建筑址的性质与年代,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其始建年代有前燕、后燕两说^[49]。以三燕兴亡为限,则该遗址宽泛的年代跨度应为337~436年。通过梳理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笔者倾向于前燕说。《晋书》记载,前秦征服前燕后,苻坚对前燕强硬态度,“坚徙暉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50]。依据前引《三国史记》可知,对于曾经与前燕为邻的高句丽政权,苻坚则采取了和平政策:派遣

使者、输送佛教。高句丽小兽林王不仅接待了苻坚的政治使者,同时,也开启了佛教在高句丽境内传播之门。基于当时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为了摆脱前秦的高压统治,亡国后心态复杂的前燕工匠随着僧侣进入图们江流域,创建了古城村1号寺庙址。在营建佛教寺院的过程中,瓦作产品的制作沿袭了前燕技术,瓦当的纹样构图则融合了前燕、高句丽瓦当纹饰的双重因素^[51]。

综上所述,以瓦作产品为切入点,本文所列的三处寺庙址的年代序列如下:古城村1号寺庙址始建于高句丽政权以国内城为都之时,佛教进入图们江流域的时间应该与其传入鸭绿江流域同步或略晚,两者基本上属于平行关系;杨木林子寺庙址是高句丽政权迁都平壤后,高句丽僧侣营建的佛寺;河南屯寺庙址则是目前已知的渤海时期最早的佛寺故址。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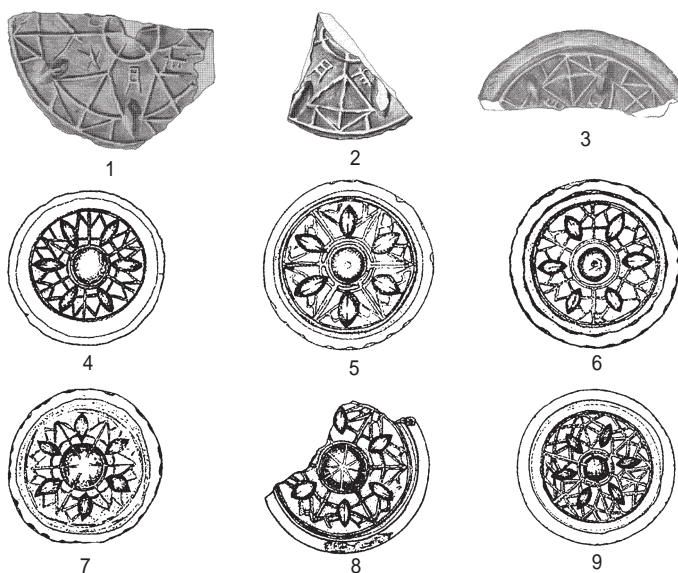
通过开展瓦作产品的类型学考察,不但明确了图们江流域渤海建国初期的佛教遗存,尤为重要,进一步辨识出高句丽时期的佛教遗存。其意义在于,新的发现突破了以往研究的局限,使我们不仅得以重新审视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年代上限,而且可以细化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具体途径。

究竟图们江流域是否留存有高句丽时期遗存,由于缺少必要的实质性关注,学术界始终未能形成明确的学术判断。本文围绕杨木林子寺庙址、古城村1号寺庙址而开展的实证研究,一方面从尘封多年的馆藏文物中获取了新的认知线索,另一方面为追寻文献记载的“高句丽旧地”栅城故址开辟了新的视野空间。在以往的研究中,学术界曾围绕

珲春河流域的萨其城、温特赫部城讨论过栅城故址问题^[52]。新的瓦作产品、佛教遗存研究表明,珲春河流域不仅是栅城治理的中心区域,也是图们江流域最早被佛教波及影响的地区。高句丽政权以国内城为都之时,亡国后的前燕制瓦工匠随僧侣进入珲春河流域,他们所营建的古城村1号佛寺是图们江流域最早的佛教寺院。高句丽迁都平壤后,珲春河流域出现了高句丽僧侣建造的杨木林子佛寺。基于上述研究得出的认识是,佛教于高句丽时期传入图们江流域,不过,传播路线的起点不是高句丽本土,而是其域外的辽西三燕地区。

关于渤海佛教的缘起,有人主张其对高句丽佛教的继承性,有人强调唐朝佛教给予的全面影响,但均因学术视野广度、学术认识深度方面的缺失而没有形成倾向性的学术认同。

依据现有资料,河南屯寺庙址是渤海时期最早的佛寺故址,但其并不是图们江流域最早的佛教遗存。同时,虽然图们江流域的佛教初始于高句丽时期,但最早向图们江流域传播佛教的并不是高句丽僧侣。初步判断,小兽林王执政时期,图们江流域几乎与高句丽中心区域



图四 网格纹复合枣核纹瓦当

1~3.古城村1号寺庙址 4~9.金岭寺

同步出现了佛教僧侣的身影。基于造像研究,高句丽时期以及渤海定都上京以前的佛像均沿袭了汉地北朝至隋的造像风格,不存在个性化的具有传承关系的高句丽—渤海系佛造像。

- [1] 《三国志·魏书·乌丸传》:“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依存口授《浮屠经》”,学术界视之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三国志》,第865页,中华书局,1959年。
- [2] 《晋书·慕容皝载记》,第2826页,中华书局,1975年。
- [3]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218~230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 [4] 同[3]。
- [5] 王飞峰《冬寿墓莲花纹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 [6] 龙山时代的陶寺遗址、陈桥遗址已经发现有板瓦或筒瓦标本。请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何努《陶寺城址宫殿区发现的陶板试析及陶寺文化的板瓦》,《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建筑构件》,《文物》2011年第3期。
- [7]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扶风、岐山周代遗址和墓葬调查发掘报告》,《考古》1963年第12期。
- [8] 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第209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 [9] 作为外来宗教,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土传播,是由于当朝执政者的崇奉与许可。东晋时,开始出现管理宗教事务的专门机构,《续高僧传·后梁荆大僧正释僧迁传》载,“晋氏始置僧司”。其后,北朝置“道人统”、“沙门统”,唐时依托鸿胪寺管理僧侣。自南北朝时期开始,通过“度牒”制度对僧侣个人实施著录管理,《僧史略》曰:“度牒自南北朝有之。”
- [10] 《三国史记·地理志四》引贾耽《古今郡国志》云:“渤海国南海、鸭绿、扶余、栅城四府,并是高句丽旧地也,自新罗并泉都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三国史记》,第45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 [11] 据《松漠纪闻·渤海国》:渤海“其国初,仿唐置官司,国少浮图。”《四库全书·杂史类·松漠纪闻》,第407~6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12] 《旧唐书·东夷列传》,第5320页,中华书局,1975年。
- [13] 耿铁华在其著述中披露的集安市博物馆档案资料,可参考耿铁华《中国高句丽史》,第53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 [14] 魏存成《高句丽考古》,第97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
- [15] [日]关野贞著,薛华、牛宁译《日本飞鸟时代的建筑》,《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该文节选自[日]关野贞《日本建筑史精要》,(日)岩波书店,1937年。
- [16] 有学者认为,图们江流域出土的席纹、网纹板瓦属于高句丽时期遗物,可参考延边博物馆《延边文物简编》,第54~62页,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年。
- [17]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第11405页,中华书局,1982年。
- [18]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第378页,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
- [19] 宋玉彬《渤海瓦当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年。
- [20] 郭文魁《和龙渤海古墓出土的几件金饰》,《文物》1973年第8期。
- [21] [日]鸟山喜一《渤海中京考》,《考古学杂志》第34卷第1号,1944年;[日]斋藤优《半拉城と他の史蹟》,第74~78页,半拉城刊行会,1978年。
- [22] 李健才、陈相伟《渤海的中京和朝贡道》,《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
- [2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 [24] 何明《吉林和龙高产渤海寺庙址》,《北方文物》1985年第4期。
- [25] 宋玉彬等主编《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渤海文物集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
- [26]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 [27] 目前,河南屯寺庙址出土的檐头板瓦标本尚不见于图们江流域的其他渤海时期遗存,这是形成本文认识的理由之一。资料现存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28] 同[19]。
- [29] 关于河南屯寺庙址出土瓦当的类型学划分,请参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 [30]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珲春县文物志》,内部资料,1984年。
- [31] 两件标本分别藏于珲春市文物管理所(藏品号:83HYY:5)、吉林省博物院(藏品号:1629)。
- [32] 王飞峰《高句丽瓦当研究》,韩国高丽大学大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年。

- [33] 吉林省博物馆藏品(藏品号:1630)。
- [34] [日]小嶋芳孝《图们江流域の渤海都城と瓦当》,《東アジアの都城と渤海》,財団法人东洋文庫丛刊第64号,2005年。
- [35] 延边博物馆《延边文物简编》,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年。
- [36]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琿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遗物整理简报》,《文物》本期。
- [37] 同[36]。
- [38] [日]斋藤优《半拉城と他の史蹟》,半拉城刊行会,1978年。
- [39] 同[38]。
- [40]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龙井县文物志》,内部资料,1984年。
- [41] 琿春市文物管理所藏品。
- [42] 本文所言枣核纹即学术界惯称的莲瓣纹。
- [43] 与高句丽时期的双重(内外两圈)主题纹饰、平行(环形并列)主题纹饰的构图模式不同,该型瓦当的复合主题纹饰属于叠加式或叠层式构图。
- [44] 辛岩等《辽宁北票金岭寺魏晋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
- [45] 万雄飞、白宝玉《朝阳老城北大街出土的3~6世纪莲花纹瓦当初探》,《东北亚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2010年。
- [46] 此种套接技术的特点是,当面套接在边轮之中,瓦当背面留存有明显的边轮包裹当面痕迹。
- [47] 同[32]。
- [48] 耿铁华《集安出土卷云纹瓦当研究》,《东北史地》2007年第4期。
- [49] 关于前燕说,可参考田立坤《金岭寺建筑址为“庙宇”说》,《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关于后燕说,可参考王飞峰《三燕瓦当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 [50] 《晋书·慕容暉载记》,第2858页,中华书局,1975年。
- [51] 此时,正是高句丽流行干支纪年铭文卷云纹瓦当时期。因此,工匠制作瓦当时,在网格纹复合枣核纹的纹样之上融入了干支纪年铭文因素。
- [52] 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第73、7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同[35]。

(责任编辑:杨冠华)

On the Dat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the Tumen River Valley

Song Yubin

It is a brand-new academic attempt to explore the earliest tim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the Tumen River Valley. This paper conducted empirical researches surrounding the Yangmu Linzi Temple Site and the Temple Site No. 1 at Gucheng Village: on one hand, new cognizing clu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long-forgotten artifacts collected in the museums; on the other hand, new views were opened for the seeking of the site of the Zhacheng Prefecture, which was the "old prefecture of the Koguryo Kingdom" recorded in the historic literature. The new-discovered architectural parts and Buddhist relics and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unchun River Valley was not only the central zone of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of the Zhacheng Prefecture but also the area influenced the earliest by the Buddhism. When the Guonei City was the capital of the Koguryo Kingdom, the architectural pottery craftsmen of the downfallen Former Yan Kingdom entered the Hunchun River Valley following the Buddhist monks, and the Temple Site No. 1 at Gucheng Village constructed by them was the earliest Buddhist temple in the Tumen River Valley. Based on the newes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ferring to the historic literature, this paper dre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Tumen River Valley during the Koguryo Kingdom period.

文物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

2000年8~10月和2001年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东大杖子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15座,出土器物近150件(套),主要为铜器,其次为陶器,另有少量玉石器等,按用途可分为容器、兵器、车马器等。就墓葬的总体性质而言,应属于北方地区青铜时代典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即属于“青铜短剑墓”的文化范畴。根据出土器物判断,墓葬的年代应为战国早期前后。此次发掘为探讨辽西地区各类型青铜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中原燕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资料。

吉林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遗物整理简报

古城村1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1995年6月,古城村村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发现了石块、佛造像及陶瓦等遗物。经研究,这些遗物来自1号寺庙遗址。佛造像质地有白石、灰色砂岩及泥质陶等。石造像种类较多,有佛坐像、佛头像、菩萨造像、莲花化生、千佛、头光、背光、莲台等。建筑构件有筒瓦、板瓦等。综合佛像、瓦作遗物的形制特点,初步推测,古城村1号寺庙址的年代不晚于渤海国建国初期,可以视其为图们江流域现已确认的年代最早的佛教寺院。

试论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初始时间

探索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初始时间,属于全新的学术尝试。本文围绕杨木林子寺庙址、古城村1号寺庙址开展了实证研究:一方面,从尘封多年的馆藏文物中获取了新的认知线索;另一方面,为追寻文献记载的“高句丽旧地”栅城府故址开辟了新的视野空间。新的瓦作产品、佛教遗存研究表明,珲春河流域不仅是栅城府治理的中心区域,也是图们江流域最早被佛教影响的地区。高句丽政权以国内城为都之时,亡国后的前燕制瓦工匠随僧侣进入珲春河流域,他们营建的古城村1号佛寺是图们江流域最早的佛教寺院。基于最新的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解读,本文认为佛教于高句丽时期开始传入图们江流域。